

■新作聚焦

杨沫长篇小说《双人舞》 重建海南女性的精神血脉

□刘复生

《双人舞》是一部才华横溢的小说。它以一个略带悬疑色彩的故事,讲述了一个现代女性寻找自我精神源头的戏剧化过程。小说有着很强的故事性和可读性,在形式上具备了某些时尚流行的元素,一不小心会让人误认为是一部另类的女性情感小说。一般来说,小说好看,总会让那些有着“纯文学”洁癖的专业读者心怀疑虑,总担心上了大众文化的当。我想说的是,正如杨沫的《双人舞》表明的那样,“好看”不是原罪,它完全可以和尖锐、深刻的艺术表达相得益彰;相形之下,那些写得难看的小说并不必然高明,相反,“难看”更多的是源于叙事的无能和感受力的退化。艺术上的平庸和低能更需要“难看”和沉闷来掩饰。当冗长、乏味被认为是艺术性、深刻性的某种标志,并成为约定俗成的隐形文学价值评价尺度之时,装腔作势的烦琐无聊就会以艺术之名流行文坛,并且有恃无恐。这是当代文学最为奇诡的景象。不过,我越来越坚定地认为,如果一部小说对几乎所有类型的读者(业余的以及受过职业训练的)都不能激起愉悦感和欲罢不能的好奇,而只是一再以艺术的、思想的名义考验读者的耐心和牺牲精神,那么,我们几乎可以肯定这是一部坏小说,甚至是不道德的小说,不管它被什么权威奉为经典。

我想,不同层次的读者都会认可《双人舞》的好看,会赞叹杨沫讲故事的能力、她对叙述节奏的控制力以及她文字的优雅质地,但是,这诸多因素导致的阅读的流畅和快感也往往会让忽略、怠慢了杨沫的深意。

在我看来,《双人舞》是一部带有鲜明性别立场的小说,不同于上世纪90年代女性主义写作那么幽怨甚至暴虐——它们总是在一种与男性世界的紧张关系中展开女巫式的叙述,要么就是退回到个体化的狭小女性经验中顾影自怜,它的末流甚至借女性经验的奇观化展示暗中迎合消费主义的、男性的欲望凝视。而这部小说,从一开始就没有面对男性世界的焦虑,它只面对女性自己的问题,最重要的是,它要在社会历史的隐约背景中展开对女性生存境遇的描述,进行对女性精神血缘的探究与批判,以及对这份暧昧复杂的母系精神血统的确认与回归。这决定了《双人舞》的尖锐与大气,决定了它的惊心动魄与坚定从容。这是我所见到的进入新世纪以来最为出色的女性小说。

《双人舞》的表层故事是喻小寡探查武皇即武玉梅的秘密,随着调查的深入,另一个更大的秘密却慢慢浮现出来:那是喻小寡刻意遗忘、屏蔽的自己幽暗的历史,一个她从少年时代起就试图摆脱的沉重的梦魇。随着这个记忆深渊的打开,她再度进入曾经的创伤性场景。于是,她开启了一段打开心结、重新寻找自我的旅程。同时,这一过程也是她重新发现并审视母系精神血统的过程,由此,喻小寡重新与这份海南女性的历史基因建立了联系。杨沫以其极感性、细腻,抽丝剥茧式的叙述,包裹了一个颇具精神分析色彩的精神寻根故事。于是,一段惨烈的较量在喻小寡和武玉梅之间展开了。她们必须在互相伤害中逼近或重回那个创伤性“原点”(那是她们命运的交集),这样才能获得解脱、和解,同时获得救赎和升华。

通过武玉梅和喻小寡之间互为镜像的灵魂“双人舞”,杨沫批判性地探究了海南女性的性格基因,并重构了一个母系的海南历史与另类的中国女性的精神血缘。不难发现,小说暗含了一条从洗夫人、红色娘子军、武米把、武稻子到武玉梅的潜在线索,这是一条暧昧不明的文化胎记,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中,呈现出色彩各异、善恶不同的面貌。但是,谁又能否认这种性格深处所含有的非凡的创造力和精神能量呢?

武玉梅的形象是深刻而复杂的,她让人赞叹、同情而憎恨,她的性格扭曲,既有着个体的原因,又是海南女性的集体性格逻辑的产物,从根源上说,也是海南女性特殊的生活情境所致。武玉梅顽强求生的本能、寻求承认的强大生命能量,在本质上源于男权的压抑。这导致了武玉梅自身被男性世界的逻辑所同化,她变得粗鄙而强悍,自私而绝决。她反抗男性世界的方式也是男性的,她的异化与病态性格深深打上了父权模式的烙印。她以男权的方式参与男权化的“文革”,正是源于这种“承认的政治”的诉求,在男权天下下,她试图寻找自我的实现。

直到遇到红杉,武玉梅身上的女性生命才开始觉醒,她才意识到自己的干枯、贫瘠;透过红杉的折射,她才看到了女性的生命的意义。于红杉天生丽质,更重要的是,她身上携带着细致的文化教养所留下的痕迹,这种生理与文化自然结合的美感,尤其是来自北京的文化优势和高雅的艺术之美(芭蕾),对于武玉梅来说具有美学启蒙和性别启蒙的意义,这属于另一个她不曾见到的世界,一个与她所习惯的世界截然不同的世界。

通过于红杉的“双人舞”,武玉梅重新发现了自己的女性身份,包括女性的欲望和本能。这是武玉梅获得拯救的契机。但是,后来红杉背叛了她,这是具有毁灭作用的。真正的伤害不是来自政治后果,而是来自理想的破灭——她自救的希望破灭了。于是,她报复式地追求男性化成功以填充生命的空虚。我想,她身患绝症或许正是一种隐喻。直到那时,她才最终意识到,她是一个人生的失败者,所以,她要在有限的、残存的岁月里,要么报复于红杉,要么顽强地回到生命意义的转折处与梦想同归于尽。其实,武玉梅的无意识中还残存着某种希望,希望重温当初的美好原点,重温精神的“双人舞”,她希望在那一刻死去,并在象征意义上获得永生。于是,武玉梅走向了同样遇到危机且一直生活在心理阴影中的于红杉即喻小寡,二人的命运再度发生交集,这是一个重新理解对方,更是重新理解自己的过程。

关于红色娘子军的叙述构成了一条潜在的线索。有趣的是,采访娘子军老战士的陈娇姐正是海南女性历史生存境况的当下延续,她一方面逆来顺受,遵从男权秩序,另一方面也显示了一种海南女性特有的执拗。而武玉梅则表现出对这种生存境况的反抗,当然也表现出了这种恶劣的生存状况和反抗行动所导致的自身的粗鄙化、中性化甚至暴力化。她和红色娘子军战士一样,如男性一般劳作、如男性一般打仗,不以为异样。男权化的社会压迫以及女性们对这

种性别秩序的内化和习惯化,使她们没有像内陆女性那样充分发展柔弱、纤细的社会性别特征,没有得到男性歧视性的、宠物化的爱护,反而使她们充分地男性化了。在社会实践层面上,海南女性占居了较男性更重要的地位,这就实现了主奴的辩证法的反转,但在观念层面上,她们还没形成鲜明的自我意识,这妨碍了她们在家庭和社会中政治处境的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说,武玉梅的巨大权力欲和控制欲——以至于要去做武则天、观音,都只是以偏执和极端的形式显示了海南女性的正当权利诉求。

即使武玉梅的性别被异化,也并没有完全泯灭她内心对美的敏感和作为女性的欲望,只不过,对男性的失望使得它不可能在男性那里得到实现,这是她近乎痴狂而后又绝望地要抓住于红杉的原因,事实上,于红杉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武玉梅的内心需要所创造出来的情感投射对象。

从洗夫人、红色娘子军、武米把、武稻子、武玉梅、阿琼嫂,显示了这种海南女性不依靠男性、支配自我命运的独立性和潜在的反抗精神,尽管更多的是因为无奈和绝望。在她们身上蕴藏着巨大的生命能量。不同时代的海南女性以不同的方式延续了这一精神血缘与文化基因,尽管有时是以某种病态的形式,比如武玉梅的澹雅和武羚羊后现代式的自我内爆。即使如此,武羚羊的血液里还是继承了某种海南女性的特质,这是喻小寡禁不住迷恋她的原因,也是喻小寡表面上厌恶她的原因。

有意味的是,《双人舞》中的男性形象都非常糟糕,柏树则、阿木、海青山、常一、钟吉昌,甚至随便一个小人物如党副局长、杨儒文等,一律自私狭隘、缺乏主见、性格懦弱、薄情寡义,远不如女性有气概、有担当,即使做恶也爽快。伍家惟一的男丁武玉玺是个智障,在这个母系家族里基本是母亲的宠物,这无疑也是大有深意的一笔。

杨沫通过武玉梅这一形象的创造追索或重建了一个海南女性的精神血脉。

武玉梅一直不认同父系血缘,除了报复式地欺侮前夫家,还刻意要建一座母系的祠堂。相对于主流的大陆文明传统,这一精神血脉显然是另类的,也是令人惊叹的,不管它有多少污浊和杂质,都是千百年来中国女性生命活力和创造能量的一个证明。这也是为什么来自北京的当代女性喻小寡被深深震撼,在最后与武玉梅和解并认祖归宗的原因——在母系的意义上,她重新确认了琼海作为故乡。

我不想让读者误解,以为《双人舞》的价值在于表达了上述观念性内容。小说不同于理论专著和学术论文,观念性内容只能是艺术表达的副产品,小说的思想诉诸于你的感受性,这种思想的力度取决于文学修辞的能力,只是艺术效果的一部分。小说的成功得益于杨沫的叙述才华,她懂得如何紧凑地营建和推进内在的戏剧性,并能够在30万字的篇幅内保持不衰减的叙述能量,维系充沛的情绪,经营汁液饱满的细节。虽然小说多少还用了一些流行小说的俗套,却掩不住非同一般的才情。这种能力,在当代女作家中极为少见。她的才华还有待更广泛的阅读来加以确认。

■创作谈

起念写部海南的故事是在2009年10月。到海南近20年,从初次上岛仿佛到了国外,到现在近20年的慢慢糅合,海南终也成了一个熟悉的、但还是有点儿隔的居住地。人呢,从总想逃掉的客居,变成不十分理直气壮的新移民。虽然听不懂海南20多种语言的任何一种,但海南故事,却是大可以写一写的。海南给我总的感受是:暴烈的气候罩着植物,植物丛中藏着人;人呢,岛上的男人施泥带水地傍着自家的女人,而女人,是最后收摊儿的那个。如果要写一部海南故事,那一定是海南女人的故事。而写女性,是我步入自觉写作后的主要目标。

但我并没有马上写,家里有个高考生,我像中国大多数高三家长一样,全力以赴管理儿子的生活,观察他的精神状态。从2009年10月到来年6月,我一边管理儿子,一边在遥远的荒野上架构一个虚构大厦的脚手架,我跟它、以及陪伴儿子高考形成两个空间的穿越,在现实中,我就像河流里的水,一刻不停地、专注而沉静地载着、陪伴着儿子走完高三历程,在他上课的时间段,又间空起跳,向遥远的“海市蜃楼”送去一车砖,一捆钢筋,几袋水泥或者一些沙石——搬运完原料我总能迅速起跳,落回现实的河流。这个过程,节奏性极强,十分蒙太奇,充满了创造力。

搭架子像织布一样,因为不通当地语言,即便是20年的移民,海南对我来说还是有点儿隔,对海南的观察只能是外来的视角。我的第一根经线一定是个内地女子,她所观照的当然是海南女人,她们是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经线。我设计了内地女子喻小寡,海南女人武玉梅;在武的周边,另外设计了她的母亲武稻子、外婆武米把,女儿武羚羊、妹妹武玉兰;她的学生陈娇姐、她前夫的妻子阿琼嫂;她们是些暗蓝的或淡青的经线。

社会学者认为,海南有着独特的女性文化、巫傩文化、盐文化以及渔业生活,这些文化沉淀在妇女身上,就呈现出一种异质。比如说,1949年以后有关海南的艺术作品,我能说上来的就是《红色娘子军》和由《海岛女民兵》改编的电影《海霞》,另外一部电影《南海长城》,其中的女主角又是一位女民兵。在这些作品里,海南女子都是以兵的形象出现,而在现实中,据我观察,海南女子十分柔顺、谦卑、勤快,并不普遍具备拍案而起、甚至揭竿而起的性格特征,那么她们为何都以兵的形象进入文艺作品中呢?这是我思考研究的主要问题。于是,我扒出了洗夫人、黄道婆,70年前的琼崖纵队女战士、以及疯了的外婆武米把,不断离开自己生活之地的母亲武稻子;我又扒出了海南“军坡节”传统、“装军”仪式、民间祭祖母系祖宗的“婆期”传统。这些纬线是猩红的、乌紫的,它们与现实中的武玉梅、陈娇姐、武羚羊的故事形成交集。

舞剧《红色娘子军》是小说的重要铺设,是人物交集、故事推演的重要枢纽,它串起当下和远至1975年的故事。娘子军的故事在文本的现在进行时中,我还设计了一本纪实文学《琼崖纵队女战士》,它和《红色娘子军》形成一种比照,该书作者陈娇姐的故事,既是经线也是纬线,这两个人物和这本书可能让小说增加了厚度。另外,小说还设计了作为背景的两本书、两部电影、一个剧本创作过程,它们像白天鹅的芭蕾裙,重重叠叠、出进进、繁复簇拥,增强了小说的可读性。小说还涉及资本对艺术的倾轧、检讨“文革”中的个人错误、忏悔与宽容等元素,它们可能使小说的内部有了张力。

梳理这些经线、纬线花了我8个月的时间,当我把儿子送进大学,自己也度过第二个断乳期之后,开始将这些线头织成布,这用了14个月。光开头就写了5遍,后来出版前修订时又放弃了这个经过5遍锤炼的开头。整个小说重新叙述(从头到尾用一个腔调叙述)了3遍,写到最后,人已内胀至咽喉,身体似乎已无法与外界交换能量了。好在经过一年,当这本书出版的时候,身体已慢慢缓过来。

说写长篇像织布,仅是《双人舞》的写作心得,下一部,我肯定不用织布的方法。

像是织布
□杨沫

■看小说

王璞《红房子 白房子》 灵魂何以安居

《红房子 白房子》(《长江文艺》2013年第2期)里念兹在兹的“房子”,既非当今为表“身家”的豪宅,也不是令“房奴”们悲喜交集的蜗居之所,而是“一圈逃离在我眉心上的梦幻光环”和“一则耐人寻味的寓言”。

上世纪60年代初,10岁的“我”随母亲从东北投奔到长沙的舅舅家,3个月后奇迹般地报上了户口,还住进了一座“红房子”。在充斥着喧嚣、嘈杂和粗鄙的“城门口”,红房子有如一个美丽的童话,以其“光明、清朗、亮丽”,令现实中的种种“阴暗、腐臭、冷酷”变得不值一提。尽管没过多久,红房子在一场比赛中终成虚无,但“越过数十年的时空”,在“我”的心中,它依旧美丽如初。之后,到了上世纪70年代,“我”和男朋友以全部积蓄幸运购得一处住所,经过精心修整,一个破瓦残垣、支离破碎的旧屋变成了一所“在一片幽暗中蓦地显现的白房子”。然而,“白房子”带给“我”的并不只有幸福和喜悦,更多的则是伤痛:“我”在恢复高考制度后经过了繁忙紧张的考试,归来时它“像一团白色的光影从幽暗中浮现”,而屋子里坐着的已经是常一和他的新欢……多年以后,当“我”得知“白房子”即将被拆迁的消息,眼前依然难以消除那片“孤独、幽伤的,怯怯的白光”。青春、爱情和对幸福的憧憬,越过40岁月的烟尘,依然如海涛般涌动不息。相比肉身的住所,灵魂的寄居地在哪里?(刘凤阳)

孙颤的小说《漂移者》包含两层寓意:一是地理学上的板块移动,二是赛车急速转弯的技巧。小说主角马克从美国来到当代上海滩,需要完成一套组合动作:空间移动,快速转向,融入上海。

《漂移者》的作者找到了城市文学的一种建构方式:通过写城市中的人来写城市。这算不上新发明,却是最常用、最成功的方法。在西方城市文学传统里,通过写人物——贵族、暴发户或者梦想爬上上流社会的底层青年等——来完成对城市的文学建构,早已经被证明了是行之有效的好方法。巴尔扎克之高老头、司汤达之于连、狄更斯之奥立弗、陀思妥耶夫斯基之伊凡等都是令后世难以忘怀的典型人物。《高老头》中的拉斯蒂涅、《红与黑》中的于连等年轻人怀揣梦想来到大城市,渴望出人头地,却逐渐被残酷的现实挤压,逐渐失去原有的纯真,变成一个道德沦丧的投机者。在西方文学作品中,这已经是一个相对成熟的主题。

孙颤的小说继承了这个传统——实际上,他之前的中篇小说《拍卖师阿独》就已经这么做了。在《漂移者》中,写作对象发生了变化,从本土人士变成了国外来华的外国人。在上海这样的国际化都市中,外国人已经成为这个城市人群的一部分,也成为城市性格的一部分,他们带着各自的文化在适应着、也在改变着这个城市原有的结构和生态。国内作品很少关注这种改变,外国人作为第一叙述主角的更是少之又少。作者敏锐地找到了一个角度、一个未被关注过的观景台,由此一览城市各等人物,具有开拓性和前瞻性的意义。

■短评

城市文学从人开始

□李伟长

孙颤就此延续上了城市文学写作的一种可能——写城市人。庞大复杂的都市由一种种职业、一个个阶层、一群群人组成,关注他们,就是关注城市,书写他们,就是书写城市。在孙颤的小说中,城市人始终是重点观察的对象,《雪庐》《烟尘》《门槛》关注知识分子家族史、当代知识分子的境况,《门卫之死》《拍卖师阿独》关注城市中几类处境不同的职业和人性的变化。

《漂移者》则关注一个美国青年在中国的生活和情感经历。小说一开始侧重描写马克的情欲游戏,写他与东方女性间的暧昧。作者着重凸显他的“快乐”,意在用这部分内容过度、铺垫,表现一个不同于中国青年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的人物形象。接下来的内容聚焦商战,从中可看出许多作者对社会、经济的综合思考。孙颤展现出的对经济宏观的理解和微观的体察,不是一般作者能够写得出的,看得出作者丰富的日常积累。国企、跨国企业斗争,全球化思潮、商圈潜规则等热门话题在小说中都有涉及,增加了小说的厚度和专业性。

作者将马克塑造成了一个精通中国潜规则、并且能将其合理化的复杂人物,通过他的嘴巴,表现了他对中国企业官商结合的看法和熟练运用。通过精彩的商业博弈和权力更迭,马克的人物性格得到了细致展现:聪明、敏捷、决断

力强,对规则烂熟于心,运作起来得心应手,如鱼得水,毫无障碍。

在商业领域,马克的价值观与手段与中国商人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在生活尤其是在情感方面,美国青年的思维与中国姑娘所思所想则大相径庭。在对房产和两性相处的态度上,中国姑娘苏月想买房,马克想租房,苏月认为马克对她缺乏尊重,但马克却不这样认为。文化差异导致了两人关系的破裂,但也恰是这种差异,最终让马克认识到了问题所在,也明白了自己到底想要怎样的生活。

此外,作者还在小说中塑造了一个半个世纪前闯荡上海滩的外国商人,明显有横跨上海半个世纪前后的野心,但在文本中表现当下较多,和老上海文化少有链接,这削弱了小说的厚重和恢弘气势。如果可以在表现城市历史文化纵深性方面继续开掘,效果一定会更好。比如上海在1949年前后、改革开放前后的时代环境、人性和商业规则等的变化。观察一个城市的前世今生,需要关注类似的社会变化和由此带来的性格和命运的变化。

马克是小说的主人公,这个美国青年熟知中国式的商场文化与生意伎俩,有为人处世的“中国式”哲学,也自以为了解中国姑娘的风情,但他依旧是一个自省的失败者,事业上被人击

垮,感情上也谈不上成功。与其说小说写了一个美国人不同于中国人的价值观,不如说作品的魅力就在于写出了马克的失败,他聪明反被聪明误,他的过度自信以至于自负。正是他的失败让人物形象更加丰满,也使小说更具有感染力。作者要将马克重重地丢进中国职场,去闯、去碰、去流血、去失败,去获得新体验,而不是从一开始就给出一个精明强干的马克。

至于老马克,半个世纪前曾在上海滩淘金,认为上海可以成就马克的事业。正是在他的鼓励下,马克才来到了上海。小说虽对这个人物着以一定的笔墨,可惜没有成为亮点,也没有独特化。读者更愿意看到一个对中国有独特而深刻理解的外国老人,看到他洞悉中国人的风度、中国的商业规则和上海的城市秘密。考虑到两代外国人相差半个多世纪,读者难免要暗问:老马克的经验还能适应当下的中国吗?老马克到底透彻了中国的什么秘密?

从可读性来说,老马克这个人物的传奇性可以激起读者对半个多世纪前外国商人的想象。他就像武侠小说里的世外高人,因缘巧合传授功夫给一个年轻人——那么,老马克说出来的话,该具有怎样的智慧?或者具有怎样的分量?这需要作者提供一个系统的认知。同时,老马克经历的商业世界与马克所经历的现在同样复杂,甚至更加杂乱。这一点如果能在小说中稍加笔墨,带出老马克时代的商业中国,反观马克所处的当下中国,定会引出万般奥妙,进一步增加小说的厚重性。这样的大开大合和历史关照,对作者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孙颤关于中国经济、政治等的思考,无疑提供了这种可能。

本报讯 50年前,雷锋从辽宁走向全国。50年后,辽宁又涌现出“当代雷锋”郭明义。为使雷锋精神在辽宁这片土地上传承下去,辽宁省作协2月26日至28日组织作家“再走雷锋路”,让作家们重温雷锋成长的经历、感人的事迹和高尚的品德,创作更多优秀的作品传达“正能量”。由辽宁省作协副主席邵永胜为团长的采访团一行19人,先后走访了雷锋曾经当兵的沈阳军区抚顺雷锋纪念馆、辽阳弓长岭雷锋纪念馆、鞍钢雷锋纪念馆,以及“当代雷锋”郭明义工作的齐大山铁矿。在抚顺雷锋纪念馆,大家全面了解了雷锋的成长经历;在辽阳弓长岭纪念馆,作家们了解到雷锋作为一名普通焦化工人的生活与成长历程,很受感动;在鞍钢雷锋纪念馆,作家们看到了不同时期鞍钢人如何将雷锋“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的钉子精神传承下去,而当作家们来到郭明义工作的齐大山铁矿时,这份感怀就更加强烈。

采访中作家们纷纷表示,雷锋精神在辽宁有深厚的土地,雷

报告文学新作《编外雷锋团》传递“正能量”

本报讯(记者 王觅) 为纪念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为雷锋同志题词50周年,长篇报告文学《编外雷锋团》日前在京首发。该书由解放军出版社和中古古籍出版社共同出版,由解放军报社原副总编辑陶克和新华社军分社济南军区支社原社长蒋永武经过10年接力深入采访完成创作,深情讲述了河南邓州“编外雷锋团”560名雷锋战友坚持50年学雷

锋、续写雷锋精神的时代传奇。二月河为该书作序,赞颂“雷锋的战友个个是雷锋,他们做的好事像天上的星星,看得见、数不清”。

《编外雷锋团》以大量发生在群众身边的生动而又鲜为人知的故事,全景式展现了“编外雷锋团”认真学习践行雷锋精神、直至成为全国最大的学雷锋志愿者团体的历程。该书不仅